

电视节目的符号过程与符号霸权

——布迪厄符号权力理论研究之一

孙化显(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在理想的符号过程中,符号表意的三个环节依次具有“意图意义”、“文本意义”、“解释意义”,后者在一步步把前者具体化的同时也在一步步否定前者。而现实状况往往是缺失三环节中任一环节的“不完整符号”居多。那么,符号霸权的实现就必须在三环节的任一环节上作出必要的霸权性努力,布迪厄的符号权力理论关涉到了这一点。以电视节目为例,结合他提出的或重新定义的“资本”、“场”、“习性”等范畴,可见符号的霸权性在理想符号过程中的表意或“不完整符号”的表意都能得以实现,从而从布迪厄的社会符号学角度对符号霸权的普遍性与隐蔽性批判也得以实现。

关键词:符号过程;符号霸权;资本;场;习性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254(2016)03-0123-04

收稿日期:2015-10-03

作者简介:孙化显(1987—),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读博士生,从事艺术理论、文学理论研究。

符号如何表意,是符号学的核心问题。“符号表意,有三条悖论”^[1],即“(1)意义尚未被认知,才需要符号。(2)不存在没有意义的符号。(3)任何理解都是一个理解。”^{[1][46]}其中,第三条悖论很难理解,需要置于符号过程中来区分相应环节的意义。符号三环节以及对应意义如下:

“发送者——→ 符号信息——→ 接收者
(意图意义) (文本意义) (解释意义)”^{[1][50]}

在这个过程中,后者一步步在把前者具体化的同时也在一步步否定前者,而现实状况往往是缺失三环节中任一环节的“不完整符号”居多。所谓“不完整符号”,是指“缺失了三个环节中的任何一环的符号:意图意义、文本意义、解释意义。”^{[1][53]}虽然环节缺失,但是符号仍然携带意义,这从“符号学即意义学”^{[1][9]}的阐释中已经得到界定,泛符号导致泛意义也不无不可。

但是,当符号霸权理论因涉及意识形态等内容,阐释符号如何具体地在现实生活的符号应用中获得霸权地位时,往往因“不完整符号”等的出现而无法获得相应的理论依据。布迪厄基于社会学视角,提出或重新定义“资本”、“场”、“习性”等范畴,将符号霸权的实现形式确

定为符号与行动主体人的统一,这不仅有效地解决了泛符号与符号霸权的内在矛盾,也突出了符号使用的主体性与社会性,从而达到揭示、批判符号霸权的意识形态性的目的。所以,应用布迪厄的理论进行研究,“是现成的犀利武器,能击中其中的社会权力运作之要害”^{[1][388]}。

一、布迪厄社会学核心范畴:“资本”、“场”与“习性”

自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影响下开始语言学转向,到结构主义霸权一时,都基本表现为轻视语言(符号)与现实、文本与社会的不可分的紧密联系。但这一状况从维特根斯坦到福柯得到改变。至布迪厄,他已开始深入强调符号的意识形态操控霸权性,提出或重新定义“资本”、“场”、“习性”等范畴,已经将符号与社会、符号与主体联系起来,在此,有必要对这几个概念进行简单梳理。因为“对于概念而言,只存在系统的定义,而且概念就是被设计成以系统的方式,并以经验为依据来进行工作的,这对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永久性的启示。诸如习性、场和资本这样的概

念都可以被定义,但也只能在它们构成的理论系统之中被定义,而不是孤立地被定义”^[2]。所以,这几个范畴本身该如何确切定义,并不重要。

首先,布迪厄扩充了“资本”的范畴。“资本”一词本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常用的词汇,但在布迪厄看来,除了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还要考虑象征资本,因为这几种资本被把握时,就是知性范畴引导下的象征资本的形式,“所谓通过知性范畴,指的是确认这几种资本的特殊逻辑,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成是误认对资本占有和积累的专断性”^{[2](166)}。这也就是说,布迪厄已经将“资本”的概念扩充至文化领域,将象征资本(符号资本)看作与经济资本等同样具有生成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资本的表现范围。这就将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符号领域统一起来,将人的经济活动、文化活动、符号活动统一起来。所以,从个体行为到社会实践,行为的动力也就被归为对资本的追逐,丰富内涵了的资本,成为多领域的行为动力。

其次,布迪厄提出了“场”^{[1](387)}这个社会学范畴。他认为,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要从场的角度展开,从某种意义上“场”和“关系”具有角度的趋同性,“从场的角度思考就意味着要对有关社会世界的整个日常见解进行转换,这种见解总是只注意有形的事物”^{[2](141)},与此同时,“场没有组成部分”^{[2](149)}。而且,场没有明显的边界,它是一个特殊的空间存在,晃动的、不直观的、开阔的,一切均由其内部的权利组合,关系密切。“一个场就是一个缺乏发明者的游戏,它比任何人们能设计出来的游戏都更具流动性和更为复杂”^{[2](150)}。“能够在场的一个特定的状态下被观察到的连贯性以及明显地朝向一个共同功能的方向性(以法国著名大学为例子,可以观察到对权力场的结构的再生产),是由冲突和竞争产生的,而不是由结构的某种内在的自我发展引发的”^{[2](149)}。制度理论与场的理论有表面的相似,场的理论并非结构主义的教条。“场的概念排出了机能主义和机体论:一个特定的场的产品可以是系统性的,但它不是制度的产物,尤其不是由共同功能、内部连贯性以及自动调节来表明特征的制度的产物(制度理论中的许多先决条件都必须被抛弃)”^{[2](149)}。

“当统治者设法粉碎和取消被统治者的抵制和反应时,当所有的举措无一例外都是从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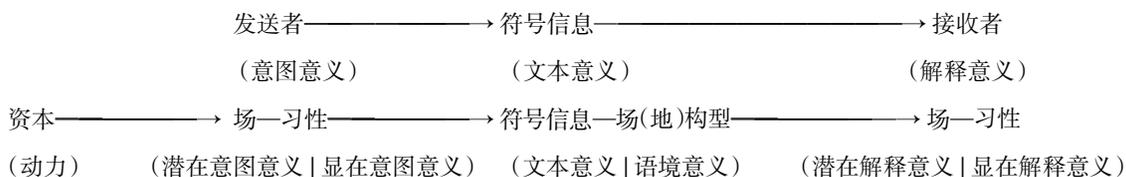
而下时,统治的效果是如此之大,以至使得构成场的斗争及其辩证法不复存在”^{[2](148)},“尤其是那些意在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2](145)}

再次,布迪厄发现了主体建构中的“习性”范畴。布迪厄在《艺术之爱》一书中,从解读博物馆展品的能力的差异出发,探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他发现,不同的人解读展品的不同能力与其心智结构相对应,而心智结构往往与教育密切相关。由此,布迪厄提出“习性”的概念,此概念,“在布尔迪厄(所引文献是这么写的)看来并非像形而上学概念一样抽象,而是象征化、符号化地体现出产生行动的‘建构中的结构’(structuring structure)。”^[3]习性与教育的关系极为密切,习性甚至带有个体所有的现存状态与过往历史,进而,潜在地操控着个体的行为,“因此,什么样的习性结构就代表着什么样的思想方式、认知结构和行为模式。”^{[3](60)}习性成为象征化、符号化的社会区隔。“消费者的社会等级对应于社会所认可的艺术等级,也对应于各种艺术内部的文类、学派、时期的等级。它所预设的便是各种趣味(tastes)发挥着‘阶级’(class)的诸种标志的功能。获得文化的方式取决于使用文化的方式”^[4]。“只有当一个人拥有了文化能力,亦即拥有用以编码艺术品的代码,一件艺术品对他而言才具有意义和旨趣。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或隐或显得感知意图和欣赏图式付诸实践(所引文献是这么写的),构建了绘画的或音乐的文化,并成为认同某个时期、学派,或者作者典型风格的隐含条件,并且在更一般意义上成为熟识美学享受所预设的作品内在逻辑的隐含条件。缺少特定代码的观赏者会感到莫名其妙,完全迷失于声音和节奏、色彩和线条的混乱之中”^{[4](9)}。

最后,“资本”、“场”、“习性”之间有着内在的关系。场与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多个位置之间的关系构成一个场,“由这些位置所产生的决定性力量已经强加到占据这些位置的占有者、行动者或体制之上,这些位置是由占据者在权力(或资本)的分布结构中目前的、或潜在的境遇所界定的;对这些权力(或资本)的占有,也意味着对这个场的特殊利润的控制。”^{[2](142)}由此可见,位置关系控制下的场,最终基本都走向对特殊的利益的控制。也可以说,“资本生成了一种权力来控制场,控制生产或再生产的物质化的或具体化的工具,这种生产或再生产的

分布构成了场的结构,资本还生成了一种权力来控制那些界定场的普通功能的规律性和规则,并且因此控制了在场中产生的利润”^{[2](147)}。这体现了习性、场的微妙关系,习性可以洞察“产生于铭写在人的躯体(生物学的个体)中的社会制度;从场的角度我们可以观察到客体关系的体系,它们是铭写在事物或机制中的制度的产物,这些事物和制度具有物理学意义上的客体的准现实性。”^{[2](174)}总之,习性、场这两个含义深刻的范畴共同运作:场在潜移默化下塑造了习性,习性潜在地“体现一组相交的场的内在必要性的产物,这些相交或脱节的程度是一个被区分的、甚至被撕碎的习性的核心问题。”^{[2](174-175)}同时,这是认识的不断深化、逻辑性不断丰富过程。

总之,布迪厄认为,习性是连接场域与资本的纽带,理解资本需要拓宽资本的范畴;理解场



由此表可以看出资本、场、习性对于符号过程的重要意义:

首先,三个范畴潜在地细化了符号过程。在此,资本成为符号过程的动力,特别是符号资本、象征资本这种以期被阐释的欲望及转化为意蕴更丰富的企图。符号发送者对应习性,在习性的特征下也就区别了发送者的显在意图意义和潜在意图意义;同样,由于主体习性的缘故,接收者的解释意义亦可分为显在解释意义和潜在解释意义。在符号信息的文本意义角度,对符号信息的考察不得不考虑场在不同的力量构型中的语境意义。与此同时,在符号的发送和接收两个环节中,同样应考虑场的存在与影响。

其次,符号霸权的实现在符号过程中表现为显在霸权与潜在霸权的交织与组合,表现为符号资本的鬼使神差,表现为霸权权力在各种场中争取地位与压迫权。所以,符号霸权在符号过程三环节中是通过最初的符号资本驱动,进而通过或隐或显的意图压迫,再到直接、间接的各种场内力量构型影响,最后使整体符号霸权语境的方式得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符号霸权的实现形式得到丰富,不仅有冠冕堂皇的表面霸权,而且也暗渡陈仓地建构起主体无从察觉

就要既看到其外部的模糊性,又看到其内部的构型下的斗争性;理解习性就要看到个体无法超越和摆脱的潜在的趣味与无意识的行动。这几个范畴不仅成为理解布迪厄符号权力理论的关键,也是走进其社会学思想的关键。

二、符号过程与范畴融入:一种理论构想

笔者认为,布迪厄是用社会学观念、方法来对待符号学的,他的有关符号霸权的理论,赖于前文论述的资本、场、习性等范畴的提出或重新定义。他不仅将符号与社会生活建立联系,强调符号过程的社会性,而且也有效地阐明了符号过程中断的“不完整符号”与符号霸权得以实现的可能性。符号过程三环节在资本、场、习性等范畴作为视角进入后,如下表:

的霸权压迫与隐蔽威胁。

再次,在此视野下,“不完整符号”不仅不会摆脱霸权符号的实现,反而以一种改头换面的方式进行控制。符号过程中断后,或止于发送者的意图意义,或止于符号信息的文本意义,但不论止于哪一种,都会受到符号资本的驱使,都会受到习性与场的制约与干涉,霸权符号于是自动改变策略,转为符号资本驱使下的习性潜在影响的场构型为主的符号理解模式。这种符号霸权的统治较为隐蔽,往往具有历史性与阶级性,受到教育、舆论、民族、区域等多重因素制约。

最后,布迪厄的场理论同样也构造出符号场,这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与此同时,理想化的符号表意过程及“不完整符号”在吸收社会学习性、场、资本等范畴、方法后,都可顺利地完成有意图的表意。

三、符号过程与符号霸权:以电视节目为例

符号的表意过程理论是符号学较为核心的知识,电视节目是较为典型的符号表意过程代表。在电视节目中,从策划、制作、审查到播放、

观赏等,都很好地体现着符号表意过程的诸种情况。通过上文的分析,将布迪厄范畴融入符号过程后考察电视节目发现,符号霸权特征愈发明显。

首先,从资本角度来看,看不见的电视节目的策划、制作本身就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节目一开始便带有这少数人的观念与意趣。而后,审查制度是整个符号霸权的执行者与推动力,这体现为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等等。也就是说,对于电视节目的选择与编辑,都会取决于政治立场是否正确、经济收益是否良好、文化氛围是否恰当。这只是文化符号霸权的第一步。

其次,符号过程三个环节是符号霸权灵活自主的建构过程。从发送者的意图意义来看,发送者往往代表了主流的正项符号的意旨,一般表现为显在的意图意义,电视节目内容具有明确的引导性。从符号信息的文本意义来看,电视节目呈现在电视中,每一个画面都有独立的意义,它所呈现的符号意义往往需要置于一定的语境(与电视节目的前后连续节目)(特别是在多个电视画面连续作用下),才能锁定其表层意义。从接收者的解释意义来看,接收者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力,例如,随意更改频道,随意开关电视机,等等。但是,电视节目的符号解释仍是被审查过的、被删减的、特意编制好的电视节目,这种霸权符号的堆砌,往往使观众限于幻想的自由与自足之中。所以,观看电视节目中的符号过程三环节组成的理想状态的符号表意结构,能够有效地确认符号霸权的存在,有效揭示其在一个表意过程中的各个环节的统治性。

再次,当“不完整符号”出现时,按布迪厄的观点,个体习性与场的(构型)(潜在塑造力)将起主要作用。这个时候,电视观众的阶级、受教育程度、民族、种族等因素潜在地决定了其对电视节目的观看水平。习性的潜在控制,使符号霸权的展开尤为隐蔽,不仅观众几乎无意识,甚至审查制度都不曾发觉。与此同时,场域以语境等方式建构起边界模糊的符号霸权场。在这个场中,随着不同力量之间的斗争变化,符号霸权的具体表现形式也会处于机动塑型状态,这会给电视节目观众带来不自觉的、并且往往心甘情愿的电视同化感与节目认同感。

最后,布迪厄强调习性、场、资本与符号霸权的紧密关系,并非承认非社会学视角就可忽视主体习性、场域、资本等的角度,毕竟按照符

号学及布迪厄的观点来说,符号是普遍的,习性与场也是普遍的。

结 语

符号学的社会学研究是一个大问题。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习性”、“场”、“资本”等范畴、方法,给符号学带来社会性的考察维度。在本论题中,将这三个范畴融入符号的表意过程,只是一种尝试,布迪厄并没有这样自觉地考虑。与此同时,笔者将布迪厄思想中的较为核心的这几个范畴整合到符号表意过程,并集中考察了符号霸权的问题,这并不意味着此种理论尝试仅可对应符号霸权的问题。

符号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是布迪厄符号权力理论的核心。这一理论属于符号学的社会学研究,是当代符号学向学派融合方向推进的重要维度。这种研究,往往体现为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正如赵毅衡先生所言,“符号学本质上是批判性的,它把符号意指,看成文化编织话语权力网的结果,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精神上至为契合。”^[10]因此,布迪厄的符号权力理论总体上必然带有“批评理论”^[11](Critical Theory)的特征,也代表了当代学界“马克思主义符号学”(Marxian Semiotics)这一重要学派,“这个学派的论辩展开的基本动力,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但不仅方法是符号学式的分析,其批评对象也从资本主义的经济霸权、文化霸权,转向符号霸权。这个角度切中当代资本主义的命脉,当代符号的最重要分支就是符号学社会批判”^{[11](95-10)}。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参考文献:

- [1]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46.
- [2]皮埃尔·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40.
- [3]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60.
- [4]皮埃尔·布迪厄.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引言》[M]//陶东风,周宪主编.文化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4):9.